

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



(中)

我走过的道路

(中)

茅 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我走过的道路（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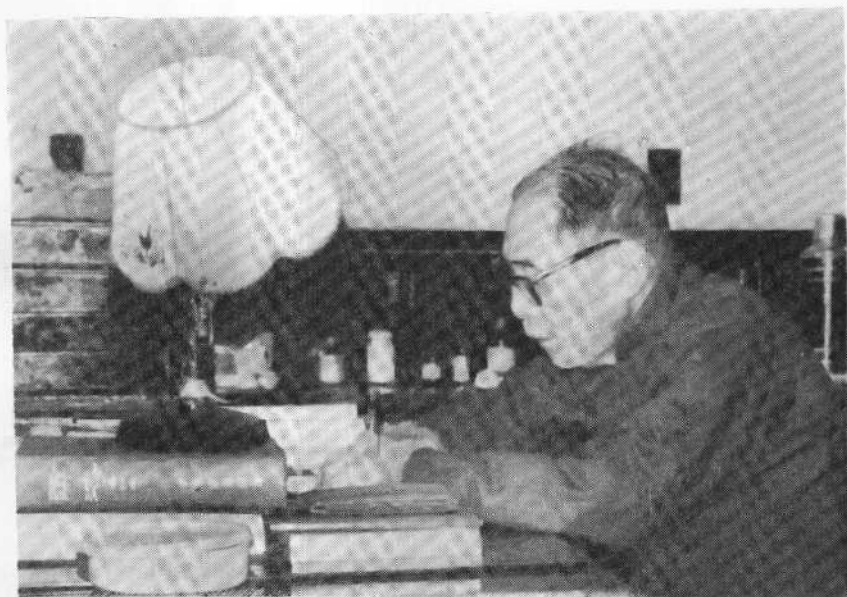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7,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12 插页3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5,400

书号 10019·3648 定价 1.25 元



作者像

多事之岁月
 (到州)
 一九三二年(壬午)听说“中法”的“自由法”要
 改革了。“自由法”也是为着“湘鄂皖”三人
 的第六次改党和十年前的“汪月”起。

记得文寿成曾言日本治他如日本时，译林报
 社“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

一样，依进步者言，陈独秀任报，而且下
 “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

而抽有限，但更大如报者见面，而中
 报“自由法”不但在“自由法”上，且在上层人士和一般
 民的知识，而止在“自由法”上。

“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

因此“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

但是，新的“自由法”是“自由法”

新的“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自由法”

一九三二年(壬午)听说“中法”的“自由法”要
 改革了。“自由法”也是为着“湘鄂皖”三人
 的第六次改党和十年前的“汪月”起。

作者手迹

目 次

2001/02 中 册

创作生涯的开始.....	1
亡命生活	18
“左联”前期	49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91
《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	124
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它	147
多事而活跃的岁月	172
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219
一九三五年记事.....	266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307
抗战前夕的文学活动	348

创作生涯的开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祉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

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正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

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

《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的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是第一次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没有把握，就决定写三个有连续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当我构思《动摇》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设想不能实现，结果只有《幻灭》中的个别人物出现在《动摇》中。

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历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幻灭》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后来的《动

摇》和《追求》也着重写了女性。这有它的原因。“五卅”运动前后，德沚从事于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入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



1928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幻灭》初版本封面

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

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气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埔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去了。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成的希望》，对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他突然来找我，这时他已经是个连长。他说，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在东江打陈炯明，那时是个班长，东江战役结束就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我问他对时局有何感想，他说，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军人只管打仗。他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我觉得奇怪，他在上海写小说时还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告诉我，他仍在写东西，并拿出一本名叫《红光》的诗集原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那时，我正与孙伏园筹组文学团体“上游社”，就拉他列名为发起人。顾仲起住在旅馆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来了几个妓女，同她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又叫她们走了。当时军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问旅馆的茶房。茶房说，这位客人几乎天天如此，叫妓女来，跟她们谈一阵，又让她们走，从不留

一个过夜。原来他叫妓女也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幻灭》中的强连长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写这样的一种人对革命的幻灭。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原来用的笔名如“玄珠”、“郎损”等，这时候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写的《蚀》的新版“后记”中，写过一段说明，现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时也逐渐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这草头就是叶圣陶给我加上的。原来我把《幻灭》的前半部原稿交给了圣陶后，第二天他就来找我，说，写得好，《小说月报》正缺这样的稿件，就准备登在九月份的杂志上，今天就发稿。我吃惊道，小说还没有写完呢！他说不妨事，九月号登一半，十月号再登后一半，又解释道，九月号再有十天就要出版，等你写完是来不及的。我只好同意。他又说，这笔名“矛盾”一看就知道是假名，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来查问原作者，我们就为难了，不如“矛”上加个草头，“茅”姓甚多，不会引起注意。我也同意

了。这样，就用了茅盾这笔名。

十月上旬写完《幻灭》，我从头看了一遍，觉得结构松散，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份素材。但再作大的修改已不可能，也无此心情，不如写下一篇时，对全篇布局多加注意。但是我正要构思《动摇》，圣陶却又来约我写评论文章了。他说，《小说月报》缺这方面的稿件，而我正是“此中老手”。他建议我写鲁迅论。我同意了。但第一篇写出来的却是《王鲁彦论》。我这是避难就易。全面评论一个作家，我也是初次。对王鲁彦的作品，评论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第二篇我才写了《鲁迅论》。可是，在十一月份的《小说月报》上首先登出来的却仍旧是《鲁迅论》，因为叶圣陶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来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那时鲁迅刚从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他的意思。《鲁迅论》我署的笔名是“方璧”，这是从“玄珠”演化来的。没有署“茅盾”，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在这篇论文中，我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我说，读鲁迅的小说，能引起我们极深切的同情：“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着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我们只觉得这是中国的，这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咒诅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能不慷慨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我以为《呐喊》和《彷徨

徨》所以值得并且逼迫我们一遍一遍地翻读而不厌倦，原因就在这里。我又说，喜欢读鲁迅小说的人们，还应该去读鲁迅的杂文，因为鲁迅的杂文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如果小说里有反面的解释，那么杂文就是正面的说明。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从鲁迅的杂文，可以看到他胸中燃着青春之火，看到他是青年最好的导师，虽然他不肯自认。鲁迅从不板起脸教训青年，然而却随时在指引青年如何生活和行动。他鼓励青年“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鼓励青年去除旧革新，争生存不能苟活，求温饱不尚奢侈，要发展不是放纵。但是他又告诫青年要学会“韧性”，而且他也不赞成无谓的牺牲。在文章中我还认为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我们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我说，“人类原是十分不完全的东西，全璧的圣人是没有的。但是赤裸裸地把自己剥露了给世人看，在现在这世间，可惜竟不多了。鲁迅板着脸，专剥露别人的虚伪的外套，然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我说，鲁迅虽然“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有“一颗质朴的心，热而且跳的心”。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十月八日，鲁迅搬到景云里来了，住在23号，他家前门正对着我家的后门。过了两天，周建人陪鲁迅来看我。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他去厦门大学路过上海的时候，郑振铎在“消闲别墅”请鲁迅吃饭，我是陪客之一，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次见面，我们谈得就多些。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

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去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我谈到了我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的失败，鲁迅则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大家感慨颇多。他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并且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是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再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第二篇就是《动摇》。《动摇》是经过冷静的思索，比较有计划写的。是要借写武汉政府下湖北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来影射武汉大革命的动乱，利用县城的小场面，由小见大。是要写大革命时期一大部分人对革命的心理状态，他们动摇于左右之间，也动摇于成功或者失败之间。《动摇》里的重要人物，国民党“左派”方罗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动摇的结果是思想上的矛盾、迷惘乃至错乱。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土豪劣绅的代表胡国光，他混进革命阵营，却以极左的面貌大肆活动，当时议论纷纷的所谓“过火行为”，很多就是胡国光这班人制造的。他们以比共产党人还要“左”的面貌出现，从而破坏共产党的声誉，破坏革命，然后本相毕露，血腥镇压革命。《动摇》的生活素材，取自我主编《汉口民国日报》时听到和看到的，可以说，我在《动摇》中只不过反映了当时湖北各县发生的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的一鳞半爪。《动摇》就是如实地写了革命的失败和反革命的胜利。我没有离开现实，凭空制造光明的前景，我也没有写正面人物，我只写了一个李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样的党员我见过不少，但我没有重笔写他，因为在《动摇》中，李克也无回天之力，革命失败

的责任只能让方罗兰们去承担。

《动摇》用一个半月时间方始定稿。比《幻灭》长，大约有十万字。等到写完，德沚和母亲已在忙着准备过年了。

写完《动摇》，我松了一口气，转而写了些文艺论文、散文、神话研究，以及翻译了一个中篇：新希腊帕拉玛兹的小说《一个人的死》。（所谓“新希腊”，是用现代的希腊语写的，以别于古代的希腊语。）文艺论文有《伊本纳兹评传》、《帕拉玛兹评传》和《小说研究ABC》，后者是在一篇旧稿《人物的研究》（刊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三号）的基础上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神话研究，除了将还在一九二六年就写成初稿的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写定，并题名《中国神话研究ABC》外，还写了《自然界的神话》、《神话的意义和类别》等五篇短文。此外，我还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

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候，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分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分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这个批评是中肯的。但这并非我的本意。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悲痛消沉，我的确不知道以后革命应走怎样的路，但我并不认为中国革命到此就完了。我冷静地咀嚼了武汉时期的一切，我想，一场大风暴过去了，但引起这场风暴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仍是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军阀买办统治的国家，只是换上了新的代理人蒋介石。所以革命是一定还要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时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到一九二七年就发展到五万党员，谁能说共产党经此挫折，遂一蹶不振？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史不绝书，难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反而一遭挫折就不能再起？这是谁也不

能相信的。当然，革命起来了也许还会失败，但最后终归要胜利的。为了辩解，也为了表白我的这种信念，我写了《创造》。这是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时我戏用欧洲古典主义戏曲的“三一律”来写。故事发生于早晨一小时内，地点始终在卧室，人物只有两个：君实和娴娴夫妇。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